

唐宋明州制瓷业发展述论^{*}

——以考古资料为主的考察

苏金花

内容提要:本文以考古资料为主,考察唐宋时期明州制瓷业的发展特点,探讨唐宋时期明州制瓷业的发展水平,分析影响唐宋时期明州制瓷业发展的主要因素,重新认识明州制瓷业在越窑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唐宋时期明州制瓷业经历了从初期、发展、繁荣到衰落的演变过程,形成了上林湖和东钱湖两个制瓷中心。晚唐、五代、北宋中期的明州秘色瓷代表了唐宋时期越窑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平。明州经济的发展、优良的制瓷环境、便利的运输条件、高超的工艺以及强烈的社会偏好,促进了明州制瓷业发展。北方青瓷发展和南方新瓷的崛起以及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使得明州制瓷业逐渐丧失竞争力,开始走向衰落。

关键词:明州 制瓷业 秘色瓷 兴衰

传统文献中关于明州制瓷业的记载甚少,无论是传统手工业史或者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涉及明州制瓷业的内容均相对较少。^①随着古瓷窑遗址的逐步发掘,明州制瓷业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研究多以贸易史或陶瓷史的视角展开。^②本文以考古资料为主,结合传世典籍,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唐宋时期明州制瓷业的发展特点,探讨其发展水平,分析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重新认识明州制瓷业在越窑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唐宋时期明州制瓷业的发展特点

从已发现瓷窑的年代来看,明州制瓷业历史悠久。目前发现的246处窑址中,东汉13处,东汉—三国3处,三国1处,三国—晋1处,东晋7处,南朝3处,唐代86处,唐—五代6处,唐—宋15处,五

[作者简介] 苏金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36。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传统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历史分析——以贸易和交通为视角”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关于唐宋手工业研究,重要著述包括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上述论著中有关唐宋时期陶瓷手工业,或有涉及浙江越窑,但未提及明州。关于唐宋明州经济史研究,重要论著包括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两书都涉及到明州制瓷业,但论述简略,未深入展开。

② 贸易史及陶瓷史相关研究较多,尤其以考古学界成果斐然。代表性成果参见林士民《浙江宁波东钱湖窑场调查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1990年第3期;林士民《试论明州港的历代青瓷外销》,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等编印:《海交史研究》第5期,1983年印行,第98—104页;林士民《唐代明州港与日本博多港对比研究》,《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9年第6期;林士民《浙江宁波市出土的一批唐代瓷器》,《文物》1976年第7期;林士民《浙江宁波市唐宋子城遗址》,《考古》2002年第3期;林士民《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虞浩旭《试论唐宋元时期明州港的瓷器外销及地位》,《景德镇陶瓷》1999年第4期;虞浩旭《论唐宋时期往来中日间的明州商帮》,《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虞浩旭《从宁波出土长沙窑瓷器看唐时明州港的腹地》,《景德镇陶瓷》1996年第2期;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秦大树、任林梅《早期海上贸易中的越窑青瓷及相关问题讨论》,《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2期;秦大树《拾遗南海 补阙中土——从井里汶沉船出水瓷器看越窑兴衰》,《东方收藏》2012年第2期。其他相关研究不再一一列举,可参见文中注释。

代15处,五代—北宋53处,宋3处,北宋33处,北宋—南宋7处。^①由此可知,明州从东汉时期开始烧造瓷器,三国两晋南朝缓慢发展,唐、五代、北宋早期和中期繁荣发展,北宋晚期至南宋开始衰落。

从瓷窑的地理分布来看,明州制瓷业发展广泛。江北区7处:东汉晚期3处,三国—晋1处,南朝1处;镇海区4处:唐代3处,北宋1处;鄞县22处:东汉晚期3处,三国1处,唐代2处,五代—北宋16处;奉化县11处:晚唐—北宋2处,五代—北宋6处,北宋3处;宁海县2处:宋代2处;象山县6处:唐1处,北宋4处,明清1处;^②慈溪县202处:东汉7处,东汉—三国3处,东晋7处,南朝2处,唐80处,唐—五代6处,唐—北宋14处,唐—南宋1处,五代15处,五代—北宋31处,北宋29处,北宋—南宋7处。^③从中可见,慈溪瓷窑最多,尤以唐代最多,延续到五代、北宋,以至南宋。鄞县、奉化也是重要生产地,以北宋瓷窑为多。象山制瓷业不如慈溪等地兴盛,但延续时间长,直至明清。

(一)唐代以慈溪县上林湖为中心的制瓷业

唐代明州制瓷业以上林湖为中心,不断向四围的古银锭湖、白洋湖、里杜湖地区扩展。上林湖窑区,山势低矮,坡度平缓,自然资源丰富,蕴藏大量的瓷石矿,草木茂盛,燃料充足。湖口连接东横河,连通浙东古运河姚江,向东可达明州港,向西连通曹娥江、京杭运河,航运条件十分便利。

1. 唐上林湖制瓷业。上林湖唐代属明州慈溪县上林乡,《唐贞元十八年(802)钱罗侯墓至(志)》载:“冢葬今在明州慈溪县上林乡上林湖表东壤。”^④上林湖位于慈溪县西70里,《唐咸通七年(866)颍川且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当年八月廿九日葬于上林湖西首,从宜礼也。东冢墓,西大石,南坑,北龙口,东至慈溪县七十里。”^⑤五代、北宋以后上林湖划归余姚县。《梁开平四年(910)俞府君妻黄氏墓志》载:“大梁越州余姚县上林乡石仁里。”^⑥嘉泰《会稽志》载,上林湖在“县东北六十里,周五十八顷有奇”。^⑦上林湖大约有近百个窑址,初唐9处,盛唐16处,中唐37处,晚唐35处,五代早期35处,五代中晚期37处,北宋初中期47处,北宋晚期27处,南宋7处。

从窑址分析来看,初唐、盛唐时期上林湖地区的制瓷业还处于低谷阶段。瓷窑以制造假圈足碗、罐等为主。瓷胎灰白,含细沙;釉色青灰、青黄,釉层薄,缺少光泽。器物无装饰,均为素面。有少量匣钵,大部分仍采用明火叠烧。中唐时期,上林湖制瓷业较前期有很大的进步。以宽足碗和翻口、深腹、圈足碗为主。胎质灰白,细腻;釉色以青黄为主,青灰次之,釉层均匀,光洁,有玻璃质感,多满釉。器表装饰以素面为主,刻划花次之。普遍使用匣钵装烧。

晚唐时期上林湖瓷窑林立,生产规模大,制瓷业达到鼎盛时期。器物胎质细腻,制作十分规整,造型优美,品种繁多。碗盘仿照金银器皿。釉色以青黄为主,也有青灰、青绿,并有浓淡、深浅之分。装饰线条以划为主,刻划兼用少见。亦出现刻划文字,模印花纹和褐色彩绘。普遍使用匣钵,有夹砂耐火土匣钵和与瓷质匣钵。

五代时期制成品釉色仍保持晚唐特点,器物以水盂、碗、盒等为主,釉色润泽,以青黄为主,还有绿玉色,器物小巧精致,光泽美观。北宋前期盛行纤细划花,釉色趋于透明,釉层稍薄。北宋晚期上林湖瓷窑数量锐减,产品制作粗糙,胎质不太细密,釉色灰暗,无光泽,器表刻划草率,多数为明火叠

① 林士民:《浙江宁波古代瓷窑遗址概述》,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2辑,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0页;阮平尔:《浙江古陶瓷的发现与探索》,《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② 熊贵奇:《象窑之谜初探》,《艺术科技》2014年第9期。

③ 林士民:《浙江宁波古代瓷窑遗址概述》,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2辑,第14—20页;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5页。

④ 厉祖浩:《越窑瓷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⑤ 厉祖浩:《越窑瓷墓志》,第112页。

⑥ 厉祖浩:《越窑瓷墓志》,第158页。

⑦ 嘉泰《会稽志》卷12《八县》“余姚县”。

烧,产品质量普遍低劣。^①

2. 唐宋古银锭湖区制瓷业。古银锭湖,唐代亦属于上林乡,东至上林湖3公里,三面青山环抱,树木葱郁,坡体平缓,蕴藏丰富的瓷土资源。境内从游泾江出发,沿东横河、儒姚江直达明州。古银锭湖窑区于五代时期随上林乡划归越州余姚县。湖区窑址有唐代7处,五代7处,五代—北宋3处,北宋5处,北宋—南宋6处。其中,唐代瓷窑主要为唐代中期,以制造敞口外翻、坦腹、宽矮圈足碗为特征。胎质灰白、细腻;釉色以青黄为主,兼有青和青灰;釉色均匀、润泽;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刻花,产品部分为明火叠烧,部分为匣钵装烧。与同时期上林湖中唐瓷窑生产水平相比较,瓷器胎质、釉色、装饰等基本相似,但器面质感稍差一些,没有普遍使用匣钵装烧。五代后期的器物造型雅致,小巧玲珑,器壁较薄。釉色以青黄为主,还有青、青灰。器表以素面为主,外壁压印棱线。器物多为匣钵装烧。北宋前期的器物以纤细刻花为主,釉色有青黄、青灰和青,釉层均匀、润泽;装烧方法与前代不同,普遍采用垫圈支烧。北宋中后期器物种类明显减少,仍以饮食器具为大宗,而香具、文房用具等雅赏之物则不多见。制作逐渐趋向粗放。釉色偏青灰,缺乏莹润光泽,刻划花工艺渐趋简单。北宋后期,为提高产量多采用明火叠烧或匣钵叠烧,且在器物内部留有支垫的泥圈,从而影响了器物的美感。^②

3. 唐宋白洋湖制瓷业。白洋湖是古代的潟湖,与杜湖相邻,距离上林湖2.5公里,水道畅通,出古浦可直达明州港。唐代白洋湖属于鸣鹤乡,唐初属于余姚县。宝庆《四明志》载:“白洋湖在鸣鹤乡,唐景龙中余姚县令张辟强修筑。”^③明州设立后,鸣鹤乡划归慈溪县。《咸通六年(865)唐故庐江郡何氏墓志铭》载,“以其年七月初三日葬于慈溪县鸣鹤乡清泉里也。”^④光绪《慈溪县志》载,白洋湖在慈溪县西北六十里。^⑤唐宋白洋湖瓷窑遗址有12处,主要位于湖西岸的石马弄,其中唐代3处,唐—五代1处,唐—北宋2处,北宋6处。从发掘结果来看,晚唐五代产品以侈口、浅弧腹、低矮圈足碗为大宗,器形种类丰富,制作精细,釉色以青黄、青绿、青灰为主,灰胎,胎质粗细不一,普遍使用匣钵装烧,少量匣钵用瓷土制成,大量为夹砂粗胎。产品的刻划花纹饰精美,品种的丰富性、工艺水平的高超程度,与同时期上林湖相比毫不逊色。北宋晚期的产品以侈口、深弧腹、高圈足碗为大宗,器形种类较少,制作粗糙,釉色灰暗,绝大多数为明火叠烧。装饰简单粗疏,以刻划花为主。^⑥

4. 唐宋里杜湖制瓷业。里杜湖为古代潟湖,西与白洋湖相邻,相隔数十米,距离上林湖约2.5公里。杜湖,唐代属于慈溪县鸣鹤乡。《乾符元年(874年)唐明州慈溪县故陈府君王氏夫人墓志并序》载,“葬于当县鸣鹤乡清泉里杜湖市西青壁之下”。^⑦宝庆《四明志》载,“杜湖,县西北六十里有古湖,唐刺史任侗重加浚筑,鸣鹤一乡之田仰灌溉。”^⑧里杜湖窑址主要分布在里杜湖西岸的碗窑山、栗子山、大黄山平缓山坡上,有窑址15处,其中唐代7处,宋代8处。里杜湖唐代窑址主要为中唐时期,产品的造型、种类、制作工艺及装烧技术与上林湖瓷窑产品相似。由于匣钵并不普遍,器物品质、光泽度逊于同时期上林湖产品。里杜湖瓷窑出土的罐的柿蒂形系上印有“文”“上”“大”等字款和梅花点标记,为上林湖、白洋湖等地窑址所不见。里杜湖没有晚唐至北宋中期的窑址。北宋晚期窑址,产品釉色灰暗,器物圈足不平,还有厚薄不均的现象,刻划花粗糙,图案呆板,绝大部分器物为明火烧。^⑨

① 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第102—108页。

② 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第119—122、159—163页。

③ 宝庆《四明志》卷16《慈溪县志第一》。

④ 厉祖浩:《越窑瓷墓志》,第108页。

⑤ 光绪《慈溪县志》卷8《舆地三》。

⑥ 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第164—165、177—178页。

⑦ 厉祖浩:《越窑瓷墓志》,第126页。

⑧ 宝庆《四明志》卷16《慈溪县志第一》。

⑨ 谢纯龙:《慈溪里杜湖越窑遗址》,《东南文化》2000年第5期。

(二)五代北宋以鄞县东钱湖为中心的制瓷业

五代时期上林乡划归余姚县,余姚属于越州。鄞县东钱湖逐渐成为北宋时期明州主要的瓷器生产中心。东钱湖在县东二十五里,一名万金湖。^①唐代称“西湖”,因湖在鄞县之西,故称西湖。北宋时湖在鄞县东,改称东湖。^②东钱湖周围群山环绕,瓷土资源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经姚江可达慈溪并入大海,经横溪可到象山,经古运河可达越州。

1. 五代北宋东钱湖窑区制瓷业。鄞县东钱湖窑场是五代、北宋时期明州主要的青瓷生产中心,是仅次于慈溪上林湖窑场的第二大越窑窑场。东钱湖一带自东汉起就烧造陶瓷,到五代、北宋中期时达到高峰,北宋晚期是东钱湖制瓷业的衰落时期。东钱湖,包括邻近的奉化东钱湖窑场,目前已发现五代、北宋时期窑址达30多处。^③其中以上水岙窑址和郭童岙窑址为代表。

上水岙窑址为北宋中晚期遗址。北宋中期的瓷器制作精美,胎质、釉色均属上乘,透雕、刻划工艺精湛,产品档次多元化。普通日用瓷,如碗、盏、杯、盘等,工艺纹饰简单。为寺院或官府定烧的瓷器,釉色莹润、胎质细腻,纹饰精美,制作精细,内壁刻有字款。上水岙出土部分产品在海外有类似发现,不排除其外销的可能性。窑内出土了格式匣钵、垫圈、复合型垫具等。北宋晚期窑址,产品质量普遍较粗,胎质粗疏,釉色青黄,刻划草率,以明火裸烧为主,器形主要为碗、韩瓶等。^④

郭童岙窑址五代晚期就开始烧造,历经五代、北宋中晚期,以北宋前后为主。五代晚期器物胚胎细腻,制作精良,造型规范,品种丰富,主要包括碗、盘、盒、盏、罐等。瓷品以素面为主,以釉色取胜。也采用刻划花、镂雕等装饰。北宋早期制品制作优良,造型精巧秀丽,胎质细腻,釉色纯净,产品丰富,有格式碗、盘、盒、壶、罐、香薰等。制瓷工艺进一步提高,划花技法大量运用。北宋中期器形与以前变化不大,主要有碗、碟、盏、壶、盒、炉、罐等。划花装饰仍然流行,构图比前期简化,同时出现划花和刻花并用的装饰工艺,刻花线条较粗,花纹有浮雕感,刻花多用于罐、壶、钵等立体器物,压线技法也比较常见,多用于碗、盘、杯之类。北宋晚期,器物品种逐渐单调,主要有壶、碗等,制作比较粗糙,大量采用明火叠烧,釉色暗淡,装饰工艺、技法比较粗劣。^⑤

总体而言,东钱湖窑址器物承袭上林湖的风格,但形成了东钱湖窑场自己的风格。器物以碗、碟、杯、盘等圆形器物为主,壶、罐、瓶等立体器较少。产品釉色不稳定,青绿色釉少,闪青黄釉较多。装饰和纹饰以划花为主,比较单一。东钱湖产品比上林湖稍差,但是比同时期其他越窑精美,生产的瓷器可能以外销和进贡为主。东钱湖出土的青瓷器物和日本鸿胪馆遗址、印尼井里汶沉船、埃及福斯塔特遗址中出土的五代北宋时期一些越窑青瓷产品在釉色和纹饰方面极为相似。^⑥

2. 唐宋象山县制瓷业。象山县瓷窑遗址较少,目前发现6处,即唐代1处,宋代4处,明清1处。

唐代早期的瓷窑出土器物种类简单,以碗为主,还有盘、钵、瓶、罐等。造型古朴、结实、耐用。胎体有灰白、黄褐、褐红诸色,灰白胎质坚硬、细致,褐色类胎质粗糙。釉色品种不多,施釉只在器物的口沿至上腹部,其余均露胎。釉层较厚,釉质细腻莹润,光泽很好。器物的颈、肩、腹部有大片彩斑装饰。窑具有匣钵和垫饼,用褐色耐火泥做成,含有粗沙。与同时期上林湖瓷窑的产品质量和装烧工艺基本相同。^⑦

宋代窑址中,白象头窑址器形有碗、鸡腿瓶、盏等。釉色青中泛黄,比较浑浊;胎质青灰,比较粗糙。大百丈窑址的青瓷残器较多,器形单一,只有鸡腿瓶,瓷片胎质粗厚。东塘窑址有碗、碟、瓶、罐等十多种,以碗类和鸡腿瓶为主。器物造型古朴,釉彩单一,很少装饰。缸窑蒋窑址产品皆为鸡腿瓶,工

① 至正《四明续志》卷4《鄞县东乡》。

② 雍正《宁波府志》卷14《河渠》。

③ 林士民:《浙江宁波东钱湖窑场调查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1990年第3期。

④ 罗鹏:《宁波东钱湖上水岙窑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30日,第8版。

⑤ 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郭童岙:越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248页。

⑥ 林士民:《试论明州港的历代青瓷外销》,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等编印:《海交史研究》第5期,第98—104页。

⑦ 知宴:《浙江象山唐代青瓷窑址调查》,《考古》1979年第5期。

艺粗糙。这三个窑应该属于北宋晚期。山厂窑址产品有碗、盆、杯等,釉色为青绿、青灰、白色等,釉层较薄,光泽好,胎体灰白,烧结程度好,内外壁有花卉图案装饰。应该属于北宋早期或者中期。^①

从以上地区制瓷业发展来看,初唐时期是明州瓷业生产发展的低谷阶段,盛唐、中唐时期是其繁荣时期,晚唐、五代、北宋中期是其鼎盛时期,北宋晚期则是其衰落时期。

二、唐宋明州制瓷业发展水平:秘色瓷

唐代通常以州名窑。据陆羽《茶经》载唐时已有不少产瓷出名的州,如越窑、邢窑、鼎窑、婺窑、寿窑、洪窑等,其中以越窑瓷器品质、色泽为第一。“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若越二也。”^②唐宋文献中有不少关于“越窑”或“越瓷”的记载,却不曾见“明窑”或者“明瓷”的记载。宋元以后陶瓷文献中,也未见“明窑”和“明瓷”的记载。明州瓷之所以没有形成“明窑”或“明瓷”品牌,很大程度上与越窑瓷器在唐代早享盛名有关,也与明州、越州之间深远的行政隶属渊源有关。从陶瓷工艺角度看,明州青瓷属于越窑体系,是越窑的重要组成部分,称为越瓷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对明州而言,却是有其其实而无其名!无论是考古出土的青瓷实物还是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都可证实晚唐五代时期的明州制瓷业生产水平非常高超,代表了全国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平。

上林湖吴家溪出土的记载有“贡窑”字样的唐光启三年瓷墓志铭,为研究唐代明州瓷业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资料。《光启三年(887)唐故河间郡亡府君凌氏墓铭》载,凌倜父中和五年三月五日“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凌倜“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③上林湖贡窑生产的贡瓷称为秘色瓷。嘉靖《余姚县志》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④

何谓“秘色瓷器”?陆龟蒙《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⑤徐夔《贡余秘色茶盏》,“揅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剡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⑥两诗中的“千峰翠色”和“揅翠融青”都生动描绘了秘色瓷形色之美。宋人认为秘色瓷器为民间不得用的神秘之物,“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⑦实际上,秘色瓷器贡余之后,允许流入民间。《安道贻酒杯二首》有“敕使何时处,饶阳秘色传,贡余流入市,分到喜从天”。^⑧徐夔诗所咏即是“贡余秘色茶盏”。元明之后秘色器世不多见,论述多以宋人为绳。清人论陶者认为秘色应指瓷色而言。《文房肆考图说》云:“而陶器青为贵,五彩次之。夫瓷器之青花,霁青大釉,悉藉青料。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瓷,虽具诸色,而汝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以粉青为上。哥窑、龙泉窑,其色皆青,白地青色,亦资青料”。^⑨可见青瓷虽然都以青釉为主,但各个时代有差异,有缥色(缥为青白色)、翠色、天青色、秘色、淡青、粉青等不同。高丽青瓷称为翡色,^⑩还有称“艾色”者。^⑪从“千峰翠色”和“揅翠融青”等

① 熊贵奇:《象窑之谜初探》,《艺术科技》2014年第9期。

② 陆羽:《茶经》卷中《四之器》,文物出版社2015年影印本,第10—11页。

③ 厉祖浩:《越窑瓷墓志》,第27—36页。

④ 光绪《余姚县志》卷6《物产·货之品》。

⑤ 《全唐诗》卷629《陆龟蒙十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16页。

⑥ 《全唐诗》卷710《徐夔三》,第8174页。

⑦ 曾慥:《高斋漫录》,《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第345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影印本,第433页;赵令畤:《侯鯖录》卷6,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9页。

⑧ 曹溶:《静惕堂诗集》卷26“五言律”,清雍正刻本。

⑨ 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卷3《陶器青为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⑩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器皿三·陶尊》(《丛书集成初编》第3239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9页)载:“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

⑪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0(《丛书集成初编》第298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81页)载“越乃艾色”;汪庆正《唐越窑秘色釉和艾色釉》(《文博》1995年第6期)认为艾色是青中闪黄。

诗语来看,晚唐和吴越秘色器应均以翠绿为主。今人关于“秘色”的争论也多以瓷色为主,有所谓青色、天青色、湖绿色、青绿色、青黄色等不同。^①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向世人展示了晚唐秘色瓷器的风韵。法门寺(大唐咸通)《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石碑载:“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②其中三件秘瓷碗通体施青绿色釉,釉层均匀,光洁莹润;另两件秘瓷碗通体施青灰色釉,均匀凝润。六件秘瓷盘,两件通体施青黄色釉,四件通体施青灰色釉,均匀凝润。还有两件是漆平脱银扣秘瓷碗。可见青绿、青灰、青黄都是秘色瓷的色调。有些专家认为上林湖出土的秘色瓷瓷色与法门寺秘色瓷不完全一致,因而对于秘色瓷的生产地是否是上林湖保持怀疑。^③

随着后司岙窑址的逐步发掘整理,证实了上林湖窑瓷生产秘色瓷的推测。^④窑址出土了包括秘色瓷在内的大量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精品。秘色瓷产品以碗、盘、钵、盏、盏托、盒等为主,也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穿带壶、净瓶等,每种器物有多种造型。这些瓷器多以素面为主,造型优美,胎质细腻纯净,釉色呈天青色,施釉均匀,釉面莹润肥厚,部分器物略呈乳浊化,如冰似玉。

后司岙窑址出土了较多刻划文字的瓷质匣钵,发现了多个“官”字款瓷质匣钵。在一唐代窑炉内发现一片瓷质匣钵体,上面刻有“罗湖师秘色碗”字样,其中“秘色”二字表明此瓷质匣钵是烧造秘色瓷专用的。在一北宋早期窑址,也发现了一件瓷质匣钵上有“秘色”字样。在窑址中还出土了有“大中”“咸通”“中和”年号款的匣钵体。从以上多个年号款及底层叠压关系来看,明州至少在大中年间开始生产秘色瓷,在咸通年间前后秘色瓷占相当比例,在中和年间则秘色瓷生产达到了兴盛,一直持续到五代中期。^⑤

这些“官”字款、“秘色”字款以及年号款的瓷质匣钵说明,晚唐五代后司岙窑址是烧造宫廷用瓷的主要窑场,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制瓷水平,开创了以天青色为特征的秘色瓷产品。釉色之美取决于烧成后期窑炉内的还原气氛。上林湖晚唐时期新出现的瓷质匣钵装烧工艺,由于瓷质匣钵胎体较普通匣钵致密,加上匣钵口沿用釉浆密封,保证了产品在密封条件下烧成,开窑冷却时较好地避免二次氧化对釉色的不良影响。使其产品釉色清纯、晶莹润泽,秘色瓷就是采用这种工艺生产的。^⑥

概言之,“秘色瓷”,制作工艺精细,器形端庄优美,胎质细腻坚密,釉色以青绿为最,釉层盈润澄澈,为越窑青瓷之精粹。

三、唐宋明州制瓷业兴盛和衰落的原因

(一) 明州制瓷业兴盛的主要原因

制瓷业是唐宋时期明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提高了运输效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江浙等南方地区的生产繁荣。明州作为交通和商业的中心地带和商品中转站,农业向商品经

① 谢西营《说秘色》(《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第7期)认为“秘色”仅为青色之意,并没有其他神秘的色彩。龟井明德、王竞香《日本古代史料中“秘色”青瓷的记载与实例》(《文博》1995年第6期)指出日本古代史料称“秘色”即青色茶碗类。郑建明《后司岙窑址发掘收获》(沈岳明主编:《秘色越器》,文物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2页)认为秘色瓷釉色呈天青色。沈岳明《秘色探秘》(《东方收藏》2018年第1期)认为“青绿色”正是秘色瓷器追求的目标。林士民《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文博》1995年第6期)认为青绿釉或是青黄釉都是秘色瓷的范畴。谢纯龙《“秘色瓷”诸相关问题探讨》(《东南文化》1993年第5期)认为秘色瓷釉色以青和青绿为主,还有青灰、青黄等。

②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

③ 陆明华《唐代秘色瓷有关问题探讨》(《文博》1995年第6期)指出法门寺秘色器“除了两件平脱碗属青黄色釉外,其余十二件盘、碗、瓶均为青绿色或湖绿色釉”。

④ 郑建明:《后司岙窑址发掘收获》,沈岳明主编:《秘色越器》,第18—32页。

⑤ 林士民《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文博》1995年第6期)指出越窑秘色瓷生产最早可至元和年间。

⑥ 朱伯谦、陈克伦、承焕生:《上林湖窑晚唐时期秘色瓷生产工艺的初步探讨》,《文博》1995年第6期;故宫博物院等:《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瓷质匣钵的工艺特征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6期。

济化发展,丝制业、印刷业、造船业、制瓷业等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

明州制瓷业的兴盛与其具有制瓷业发展的优越环境息息相关。窑炉均为依山而建的龙窑,砖砌而成。背山临湖,植被茂密,燃料充足,周围蕴藏着丰富的瓷石矿。所在湖泊连通古运河、京杭大运河以及明州港口,水运条件便利,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是烧制陶瓷的理想场所。

我国古代陶瓷窑炉火焰运动方式的发展是从升焰式发展到半倒焰式(馒头窑)或平焰式(龙窑),由不能控制入窑的空气量过渡到靠竖立烟囱或窑体坡度来控制入窑的空气量,这是一大飞跃。浙江是古代龙窑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龙窑利用山坡建造,形成一定的高位差,因而具有自然抽力,可以不设烟囱,也不易受地下水的影响。龙窑能利用烟气来预热坯体,又可利用产品冷却时放出的热来预热空气,使烧成温度可高达1300℃。龙窑结构简单,投资费用少,易于建造。^①

瓷石是一种典型的黏土类陶瓷原料,是瓷器发明的决定性基础。浙江青瓷的瓷石氧化铝含量比北方黏土低,所以烧成温度较低,致密性和瓷化程度比北方高。浙江青瓷瓷石中氧化铁含量高,可以起到助燃作用,降低瓷胎烧成温度,有助于瓷胎的烧结。特别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低价铁和二氧化硅形成低熔点的玻璃,这种作用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它能使瓷胎着色,影响陶瓷的透光度。^②

明州制瓷业的繁荣发展,与唐代社会普遍流行陶瓷制品,形成对瓷器的大量需求有关。“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瓷器。”^③从明州上林湖、东钱湖等瓷窑出土的器物来看,生产瓷器均为生活用品,其中以碗为大宗,有盘、碟、盏、盏托、罐、壶、钵、水盂、痰盂、净瓶、杯、缸、罍、盒、灯、砚等日常用具,还有簋、香炉、香薰等高级用品。唐代民间饮茶之风盛行,而碗、盘、盏、盏托、杯、钵、壶、茶匙等都是用来饮茶的器具。^④瓷制品较金属制品易碎,更换频繁,需求量也较大。

唐宋时期青瓷大量进贡以及内销和外运,刺激了明州制瓷业发展。史籍中多次记载吴越钱氏向中原王朝进贡秘色瓷器。《十国春秋》载,宝大元年(即同光二年,924)秋九月,钱鏐贡唐万寿节贺礼金稜秘色瓷器;清泰二年(935)九月,钱元瓘遣使贡唐金稜秘色瓷器二百事;天福七年(942)十一月,钱弘佐贡晋秘色瓷器;乾祐二年(949)十一月,钱弘俶贡汉秘色瓷器;开宝二年(969)秋八月,钱弘俶贡秘色瓷器于宋。^⑤《册府元龟》载,天福六年十月,钱元瓘贡晋象牙诸色香药、金稜瓷器等事件万余;广顺二年(952)十一月,钱弘俶贡周秘色瓷器;广顺三年十一月,钱弘俶贡谢恩瓷器。^⑥五代时期,吴越进贡的瓷器主要是上林湖窑场所造。入宋后,钱氏也大量进贡秘色瓷器。《宋会要》载,开宝六年二月,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长春节贺礼金稜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开宝九年六月,明州节度使钱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内千事银稜。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钱弘俶进银涂金扣越器二百事;太平兴国三年四月,钱弘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⑦宋时明州所进瓷器主要为东钱湖窑场所造。北宋前期东钱湖窑厂为寺院或官府定烧的瓷器,釉色莹润、胎质细腻,纹饰精美,制作精细,内壁刻有专门字款。

明州瓷器的内销和外运主要得益于其便利的水利运输。内销首先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其次是

① 劳法盛、叶宏明、程朱海:《浙江古代龙窑和窑具的研究》,《中国陶瓷》1983年第4期。

② 叶宏明、曹鹤鸣、程朱海:《浙江古代青瓷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硅酸盐通报》1980年第3期。

③ 张谦德:《瓶花谱·品瓶》,《丛书集成初编》第1559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④ 李刚:《越窑茶具随笔》,《江西文物》1991年第4期;魏建刚:《从越窑茶具变化看越地茶文化之发展》,《农业考古》2013年第2期。

⑤ 吴任臣撰,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卷78《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宝大元年秋九月条;卷79《吴越三·文穆王世家》,清泰二年九月条;卷80《吴越四·忠献王世家》,天福七年十一月条;卷81《吴越五·忠懿王世家上》,乾祐二年十一月条;卷82《吴越六·忠懿王世家下》,开宝二年秋八月条,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97、1122、1135、1150、1166页。

⑥ 《册府元龟》卷169《帝王部·纳贡献》,同光二年九月条,清泰二年九月甲寅条,天福六年十月己丑条、辛卯条,天福七年十一月条,广顺二年十一月甲寅条,广顺三年十一月乙亥条,中华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2035、2037、2040、2041、2043、2044页。

⑦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7之4—10,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41—7844页。另,《宋史》卷480《世家三·吴越钱氏》(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01—13902页)所载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假贡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十事”与《宋会要》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条所载“假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应为同一事,但是时间有差异,以《宋史》为准。

沿运河运至杭州,再顺京杭大运河至运河北岸的商业集散地扬州,然后沿运河或长江向内陆及北方各地辐射,越窑青瓷在扬州的大量发现以及内蒙、河北、北京、河南、山西等地均有考古发现。^①在浙江宁波和义路古文化遗址出土了七百多件唐代的瓷器,其中以越窑青瓷为主,是唐宋时期的渔浦门,是当时市集所在。它的北面紧邻姚江水路,东南是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汇合处,设有海运码头,是对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②

唐代明州作为重要的港口,有大量瓷器运往海外各地。越窑青瓷起销于中唐晚唐,大量外销是在晚唐。越窑青瓷外销遍布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马来西亚、伊拉克、埃及等地,主要出土器物以各式碗为大宗,还有壶、盘、碟、罐、盒、水注、杯、托盘等生活用具。^③在海外港口、都城遗址出土的唐代大量越窑青瓷,到五代、北宋时不但范围扩大,而且品种增多。通过对上林湖等窑址的考察,学者们认为贸易陶瓷产于上林湖为多。澎湖岛港口遗址中曾出土越窑青瓷3150余件,与上林湖所产瓷器不但器物造型、纹样、釉色一致,而且字款的书写字体也相同。^④越窑瓷器8世纪后期在日本少量发现,9世纪以后则大量出现,其中包括明州定海小洞岙和鄞县东钱湖窑厂的产品。^⑤在朝鲜半岛古新罗墓葬以及港口莞岛清海镇出土了唐代明州所产青瓷,出土器物以碗为大宗。^⑥在印尼发现的多处唐宋时期的沉船上载有大量的越窑青瓷。如在爪哇勿里洞海域,发现的晚唐时期黑石号沉船上有200件左右明州越窑青瓷。在雅加达以北印坦油田附近发现的五代时期沉船上,有7000多件陶瓷,其中20%—30%都是明州越窑的青瓷。在爪哇北岸井里汶海域北宋早期沉船上有中国瓷器36万多件,其中30万件是明州越窑青瓷。^⑦

(二)明州制瓷业衰落的主要原因

越窑上起于东汉,第一次兴盛于东吴前后,东晋至隋朝进入低谷,盛唐以后再次进入上升期,中晚唐至北宋早期达到鼎盛,是唐代“南青北白”中南青的代表,北宋晚期逐渐衰落,南宋早期借鉴北方汝窑技术,再度勃兴,开创南方青瓷的新时代。越窑在东吴前后第一次兴起,当时烧造中心为越州上虞的曹娥江畔,唐宋时期越窑最鼎盛时期的烧造中心在慈溪上林湖地区,并形成上虞寺前窑和明州东钱湖窑两个次级中心。^⑧

关于唐宋时期越窑的衰落,学界的讨论相当热烈。有政治因素决定者,指出五代时期越窑的繁荣兴盛完全是由于吴越王的大量进贡而促进,衰落亦完全受到政治影响,归宋后,无需再大量频繁进贡。^⑨有经济因素决定者,认为北宋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丰富的水利资源和特别发达的人口,使得越窑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达到了空前繁荣,从而排斥了瓷业生产的继续发展的可能性。^⑩有风俗论者,认为越窑衰落的原因与宋代“斗茶”风盛行而对建窑黑瓷的选择有关。^⑪有工艺论者,认为北宋时期越窑青瓷装饰工艺缺乏创新,与北方青瓷相比缺乏竞争力。^⑫有原料论

① 虞旭浩:《北方地区出土越窑青瓷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

② 林士民:《浙江宁波市出土一批唐代瓷器》,《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5期。

③ 林士民:《试论明州港的历代青瓷外销》,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等编印:《海交史研究》第5期,1983年印行,第98—104页。

④ 林士民:《青瓷与越窑》,第151页。

⑤ 裴岚:《7—14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5页。

⑥ 林士民:《论东方航线的拓展与东亚贸易圈》,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韩国研究》第3辑,杭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55页。

⑦ 秦大树:《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

⑧ 郑建明:《21世纪以来唐宋越窑及越窑系考古的新进展》,《文物天地》2018年第9期。

⑨ 陈万里:《越器图录序言》,《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6—10页。

⑩ 李刚:《论越窑衰落与龙泉窑的兴起》,《文博》1987年第2期。

⑪ 傅振伦:《继往开来的唐越窑》,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176页。

⑫ 权奎山:《试论越窑的衰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5期。

者,认为致使越窑消失的核心因素应在越窑的胎土和釉料成分结构几乎没有变化,品质没有提升。有多因素论者,认为主要原因不仅在于窑炉、装烧、装饰、胎釉等内在方面没有改进,而且受到贡瓷减少、北方瓷窑竞争以及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等影响而导致衰落消失。^① 诸多讨论为我们多角度的思考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从对东汉至北宋上林湖等窑区青瓷胎泥以及釉色的分析来看,装烧工艺对青瓷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对上林湖历代青瓷标本的胎、釉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实验,结果表明:青瓷胎泥原料在当地开采的成分比例变化很小。从东汉至盛唐,胎色为灰白,含有少量的细沙,有气孔;至中唐,胎质细腻、紧密,胎色仍保持灰白,这种现象一直保持到北宋,无明显变化,这与胎的成分所占比例变化极其微小相一致。每个时代青瓷釉的成分变化很小。造成釉色变化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釉色成分的变化,而是取决于烧成气候的控制。同时还受到瓷器在窑内放置位置的制约,不同位置受热温度不同。就是同一原料、釉色成分相同,烧成后也会出现不同色泽。

上林湖越窑青瓷发展过程中,装烧工艺技术出现了三次变革。

第一次变革,是从明火叠烧到采用夹砂匣钵装烧。明火叠烧的青瓷,胎质灰白,含细沙;釉色青灰、青黄,釉层薄,缺少光泽。用夹砂匣钵装烧的青瓷,胎质灰白,细腻;釉色以青黄为主,青灰次之,釉层均匀、光洁,有玻璃质感。第二次变革是瓷质匣钵的出现。匣钵与坯件同质,并在接口处涂青绿釉封口,坯件在还原焰中烧成。烧成器物,胎质细腻纯净,釉色青绿,釉面莹润肥厚,达到如冰似玉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秘色瓷的生产。第三次变革是普遍使用与坯件同质的垫圈。利用瓷质垫圈作为中间环节,用夹砂耐火土匣钵取代瓷质匣钵,也可以生产出品质良好的制品,但是无法达到秘色瓷的等级,北宋以来青瓷大量使用刻花、雕琢,装饰,也是对于品质不足的一种弥补。^②

这样的装烧技术,并没有普遍使用在生产过程中。对上林湖唐宋瓷窑的调查发现,上林湖还没有一个窑厂的产品全部都是相当精美的。质量较高的窑厂同样生产粗制低劣的产品,质量较差的窑厂也有精美制品的发现。上林湖近百个唐宋瓷窑,没有出现一个瓷窑能像南宋官窑或者明清景德镇官窑一样,烧制的所有产品都能成为精致贡瓷,这也说明生产秘色瓷的贡窑属于民窑。^③ 这种装烧技术的不能普遍化,主要在于这些装烧用具制造的成本相当高。比如瓷质匣钵,要使用同质的瓷土制成,在接口处还需要涂抹青釉,烧成后,需要打破瓷质匣钵取出成品。这样瓷质匣钵使用原料多,但是只能一次性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这样高成本的产品因为社会高度的需求而存在。

随着新兴瓷窑的兴起,引导了宋代社会对青瓷审美观念的变化,秘色瓷等传统越窑青瓷已然不像唐五代或者北宋早期那样惊艳,受到社会普遍的追逐。北方汝窑烧制的淡青色瓷被誉为青瓷之冠,“屑玛瑙为油,如哥而深,微带黄,有似卵白,真所谓淡青色也。汁水莹厚如堆脂……尤以滋润薄者难得。时唐、邓、耀诸州,悉有窑,而以汝为冠。”^④ 北宋中期汝窑成为烧制御用的官窑,达到鼎盛。“汝窑宫中禁烧,唯供御拣退之后方许出卖,近尤难得。”^⑤ 南方龙泉窑烧制的青瓷新品,“其土质坚白,釉色葱翠,所谓粉骨龙泉是也。龙泉釉色有梅子青、冬青色者,可与观窑争艳。间有纹片者,俱堪珍赏。”^⑥ 进而也成为烧造宫廷御用之所。《鸡肋编》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宜加工巧。”^⑦ 南北这些瓷窑最初模仿越窑,后来又胜于越窑。

随着北宋宫廷偏好的转变,社会流行风尚也开始转变,传统越窑青瓷精品大为缩减,烧制日常器

① 白亚松:《试析越窑衰落的原因》,《陶瓷学报》2011年第2期。

② 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第114页。

③ 阮平尔:《唐光启三年瓷质罐形墓志及其相关问题讨论》,《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④ 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卷3《古今诸窑》,第213—214页。

⑤ 周辉:《清波杂志》卷5,《四部丛刊续编》第56册,上海书店1985年重印本。

⑥ 佚名:《南窑笔记·龙泉窑》,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四集》第1辑,神州国光社1947年版,第315页。

⑦ 庄绰撰,李保民校点:《鸡肋编》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物更为普遍。北宋晚期后上林湖、东钱湖、白洋湖等瓷窑生产的产品,以碗、罐、鸡腿瓶等为主,器物较少,器形单一,胎质灰暗,无光泽,器表刻划草率,多数为明火叠烧,产品质量普遍低劣。南宋时期出现越窑仿制汝窑的现象。古银锭湖南宋窑址中出土两类产品,一种产品是越窑传统青瓷类,以刻花为主;制品大量为明火烧制,也有匣钵装烧。另外一种产品仿北方汝官窑制品,釉色有淡青、淡青灰、月白、天青等,釉层有厚薄之分,中间有小气泡,呈乳浊状,具有玉质感。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刻花,装烧以垫圈、垫饼支烧和匣钵装烧。^①

通过对宋代纪年瓷器资料的收集、整理,发现北宋早期青瓷在随葬瓷器中占有较大比例,北宋中期起青瓷数量开始急剧减少,北宋晚期以后平均每座墓葬中不足一件。而新兴青白瓷异军突起,北宋晚期以后基本占一半或一半以上。^② 墓葬的情况基本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

北宋后期至南宋以后,海外青瓷的外销逐渐不再以越窑为主。在日本镰仓及京都、福冈出土的大量宋元青瓷残片中,包括宋龙泉窑与类似福建同安窑及其附近各窑或者浙江出品的青瓷。^③ 朝鲜出土的不少宋代青瓷产品主要有临汝窑印花青瓷碗、龙泉窑青瓷碗等。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出土的中国瓷器主要为浙江青瓷,大多近似北宋时期的龙泉窑产品,及南宋时期浙江、福建等地所产青瓷。马来西亚及文莱出土的宋代瓷器,青瓷胎多米红色,具有浙江龙泉窑的特征。^④ 北宋时期高丽青瓷也仿造汝窑。徐兢《奉使高丽图经》评高丽青瓷:“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⑤

应该说,唐宋以来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逐步导致了越窑以及明州制瓷业的衰落。原料和燃料短缺会限制生产的规模,但不会必然导致品质的下降。明州越窑青瓷的衰落并非源于生产工艺或者技术的落后,而是与社会对传统青瓷审美观念的变化有关,淡青、粉青成为青瓷流行的时尚,减少了对传统越窑青瓷的大量需求。

The Development of Porcelain Industry of Mingzhou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ased Mainly on the Archeological Materials

Su Jinhu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consider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Mingzhou's china indus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Yue kiln, by investigating, based mainly on archeological materials, the situation, level,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its development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china industry of Mingzhou experienced its originating, developing, flourishing, and declining, and formed two centers of china manufacturing: Shanglin Lake and Dongqian Lake. Mise china of Mingzhou during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indicates the highest level of celadon of Yue kiln. Mingzhou's china industry was enormously boosted by such factors 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excellent environment of china-making,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superb technology and strong social preferences. Its fall was triggered by development of celadon of the North and the rise of new china of the South,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aesthetic ideas.

Key Words: Mingzhou, Porcelain Industry, Mise China, Vicissitudes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第162、163页。

② 陈克伦:《宋代越窑编年的考古学考察——兼论寺龙口窑址的分期问题》,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集刊》第9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46页。

③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74页。

④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第377页。

⑤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器皿三·陶炉》,《丛书集成初编》第3239册,第110页。